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李滢波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从文化的视角对《旧约圣经》中的120位女性形象进行认真梳理和立体扫描后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一极是以被刻画成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淫妇”大利拉为代表,另一极则以被塑造成“贤妇”形象的路得为代表。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的不幸与悲哀。

关键词:《旧约圣经》;女性形象;大利拉;路得;父权制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4)03-0055-04

一、《旧约圣经》中女性的地位考察

对《圣经》人物进行人数统计后得出两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一:《圣经》记载有名有姓者3400余人(含同名同姓者)[1],其中女性150余人,不足《圣经》所载人物总数的5%;数据二:《圣经》中80%的女性出现在《旧约圣经》中。《旧约》记载人物3150人,其中女性120人,不足《旧约》总人数的5%。而《旧约》作者着墨较多且被后世文人讲述或化用较多的女性形象则更少,只有大利拉和路得等少数几个。这一数据引发出我们对旧约世界中女性地位和女性形象的关注和思考:仅占5%比例的女性在父权制的旧约世界里占据什么地位?《旧约》作者着墨较多的这几位女性又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男性作者的笔下?数据无疑表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旧约》所记载的世界彻底地以男性为中心,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作者的话语中心。

考察《旧约》的成书背景和成书过程后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旧约》是西伯来文化的遗产,犹太教的经典,反映了西伯来民族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历史,是西伯来人在巴比伦俘囚之后的五百年中整编而成的[2]。《旧约》成书时,人类社会早已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书中记载的上帝自然是一位男性,一位父神,这符合男性主宰一切的父权制社会的精神

特质。在父权制社会编撰的《旧约》对女性的蔑视是有目共睹的,其间充斥着许多否定和剥夺女性自主的内容:有名的摩西“十诫”中的第十诫规定,“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17)^①妇女被视为男人的财产,与房屋牛驴等值。父亲甚至可以将女儿出卖为奴为娼,《创世记》第19章就记载着罗得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交给恶人践踏的故事。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如以扫有三个妻子,雅各有两妻两妾,而女人交接两个男人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处于屈辱从属的地位,处在父权和夫权的支配和束缚之下。“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驯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摩太前书》2:11-15)总之,女性在家庭、婚姻和社会中必须忍辱驯服,这是旧约世界中男性权威和女性恭顺的模式。

二、位居两极的女性形象的文化透视

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女性形象,正如著名女性主义批判家肖沃尔特所说,在男性作者的笔下构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知、无私的“天使”,要么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蛮横的“恶魔”[3]。《旧约》中的女性形象也不例外。梳理

* 收稿日期:2003-12-28

作者简介:李滢波(1964-),女,湖南汉寿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

① 文中所引《圣经》译文皆摘自“和合本”。以下凡引自“和合本”的译文只在文内标注书卷名和章节,不另作注。

《旧约》中的120位女性形象后我们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她们从本质上被构造成“恶魔”,“淫妇”大利拉是其代表,或被塑造成“天使”,以“贤妇”路得为代表。从对这两位女性形象的立体扫描和文化透视中,可窥见男性作者对女性所抱有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正浓缩了《旧约》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所特有的女性观。

大利拉:被唾弃的淫妇

英雄死于美人之手的悲剧,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参孙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美貌也许是男人所希冀于女人的第一个标准,同时也是男性作者塑造“淫妇”形象时赋予女性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淫妇”,西方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笔下常出现的女性形象,被视为社会恶道德的象征。在《旧约》中给男人带来最大厄运的女人是《士师记》中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大利拉。^①大利拉在被刻画成一个背叛男人的淫妇形象,也有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记载参孙和大利拉故事的《士师记》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600年,但《士师记》记载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中公元前1225-1025年这一时期,即从约书亚死后到撒母耳兴起作上帝的先知时为止。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25)在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上极为混乱,加之各部族之间时有冲突,非利士人更是以色列人的劲敌。士师参孙有勇有谋,但好近女色。大利拉是参孙在梭烈谷爱上了的一个非利士女人。非利士人的首领因痛恨和畏惧参孙就对大利拉说:“求你诓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战胜他,捆绑制服他。我们就每人给你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士师记》16:5)大利拉因贪恋银子就答应了首领的请求,连续三次诱骗参孙说出自己力大无比的秘密,但屡遭戏弄。在大利拉甜言蜜语的多次哄骗下,经不起女人诱惑和缠磨的参孙终于把心中所藏秘密告诉了她。参孙最终落入非利士人的手中,以悲剧结束其辉煌的人生。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之死往往与美人的诱惑相关。“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似乎是作为公理被普遍接受。实际上,《士师记》并没有对大利拉的容貌做任何描述,大利拉以美色诱惑参孙也只是后人的臆测,但这种臆测足以说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即使大利拉是个美女,男人追求

与梦想的女性魅力在男性笔下也成了女人的罪过。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往往会使人同情参孙,并为之感到惋惜,而对大利拉则予以斥责和鄙视。盖世英雄参孙的悲剧一直被认为是由大利拉所致,而不在于他自身的意志薄弱和缺乏理性。从对大利拉这一女性形象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男性作者再一次用自己的笔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使由男性派生而来的女性处于遭人痛骂唾弃的地位。其实参孙惨遭身亡的首要原因是他好近女色,大利拉出卖参孙的惟一原因是她贪恋银子。好色也罢,贪财也罢,其性者近也。但男性作者试图用女性的弱点衬托男人的伟大,又将男性的失利归咎于女人的诱惑,流露出明显的贬低女性的倾向。

参孙一直是西方文人笔下经典的文学形象,参孙的故事一再被讲述,或被化用[4]。大利拉和参孙的名字总是相伴而行,但始终被刻画成一个被贬低的诱惑男人的“淫妇”形象。“大利拉”一词也因此成为现代英语词汇中“陷害男人的妖妇”的代名词。在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弥尔顿和后世文人的笔下,大利拉始终没能逃脱“淫妇”形象的厄运,一再被刻画成导致参孙悲剧结局的坏女人形象,而参孙只是个受女人欺骗的牺牲品。然而,上当受骗是缺乏智慧和理性所致,男性作者在贬低女性的同时,也给自己蒙上缺乏智慧和理性且没有意志力的阴影。文学作品中的大利拉始终以陷害参孙的妖妇形象出现,这似乎是文人们给大英雄参孙以悲剧收场的惟一途径。

在《旧约》中被男性作者刻画成为“淫妇”形象的还有《创世记》第三十九章中的“波提泛之妻”和《以西结书》阿荷拉和阿荷利巴姐妹。波提泛是当时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收买了下到埃及的约瑟,并让约瑟管理家务。约瑟“秀雅俊美”(《创世记》39:6),讨波提泛之妻的喜爱,所以“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创世记》39:7)约瑟不从。“后来她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她……”(《创世记》39:10)数次勾引约瑟不成,波提泛之妻则诬陷约瑟调戏她,致使波提泛将约瑟囚禁于监狱。和大利拉一样,波提泛之妻也被刻画成导致男人恶运的坏女人,成为社会恶道德的象征。阿荷拉和阿荷利巴是两名行淫纵欲的妖妇,被先知以西结喻为撒玛利亚(北方以色列国的首都)和耶

^① 《旧约》中关于大利拉和参孙的故事,详见《士师记》第十六章。

路撒冷(南方犹太国的首都),意指以色列人背离上帝,行邪恶不义之事。^①在这一寓言中,女性被视为不忠不义之人,同样是社会恶道德的象征。“阿荷拉和阿荷利巴”也成为后世西方文学语言中“淫乱”或“淫乱之妇”的代名词。男性作者将男人的失败或受挫归咎于女性的邪淫,同样反映出男性作者对女性的歧视和不恭。

在中国也有将淫乱的恶名归于女性的传统。“女色祸水论”同样源远流长,从妲己、褒姒、赵飞燕、武则天到陈圆圆,几乎都被视为导致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死于淫妇之手的男人,亡在女色里的英雄,在文学与传说中难以胜数,由此留下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浩叹。[5]

路得:被颂扬的贤妇

《旧约》作者似乎极端轻视女性,极力贬低女性。不过,《旧约》中也能见到几位优秀的女性形象,如智勇双全的女先知底波拉,誓死保卫同族人利益的王后以斯帖,《雅歌》中热情奔放的书拉密女和《箴言》中的“贤妇”。在《旧约》女性形象中,最令人难以忘怀且被作者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是《路得记》中的良家妇女路得。作为进入男性话语中心另一极的路得,是作为大利拉等淫妇形象的衬托而定位的,她代表着与大利拉等否定性形象绝然相反的女性形象。路得淳朴、善良,是男性所渴望的女性阴柔之美的缩影,满足了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

《路得记》以书中主要人物摩押女子路得得名,被列入旧约历史书卷之中。该书作者不详,但按其内容和体裁看,应属以色列王国时期的作品。故事短小精悍,译文仅约 3000 汉字。故事情节简单,但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路得记》开篇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代背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太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指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路得记》1:1)正是因为饥荒,拿俄米举家寄居他乡摩押。到摩押后,拿俄米的丈夫去世,两个儿子相继娶摩押女子为妻。十年后,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饱受丧夫失子之痛的拿俄米怀着一颗善良宽厚的心规劝儿媳俄尔巴和路得回娘家:“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哪!

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路得记》1:11-13)拿俄米的这段话催人泪下、断人心肠,充分体现了婆婆善良坚强且开朗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媳妇挥泪离去,而路得执意陪伴孤苦的婆母回伯利恒:“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我我相离,不然,愿耶和華重重地降罚于我!”(《路得记》1:16-17)路得和婆婆这段经典的对话成为西方文人竞相模仿的典范。路得随婆婆回到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善解人意的婆婆的安排下,路得嫁给了拿俄米的一个远房亲戚,有了美好的归宿,拿俄米也得以安享幸福的晚年。纯朴善良的路得将自己和婆婆的生死紧紧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人世间最难得的情感,这是对人性美的最好的诠释。

男性作者用自身的审美标准和心理需求塑造出他们理想中的女性形象。但在《旧约》中,男性对女性美的追求并没有体现在对女人容貌的描述上,而是着墨于她们的内在美:贤惠、善良、勤劳、屈从、忍让。《路得记》中虽没有对路得容貌的记载,但路得一直以既贤德又美貌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人墨客的笔下,她的故事成为文学家千古传诵的题材。在西方社会中,路得是妇德的楷模,路得本身已成为一种道德符号。

路得以贤德女性的形象存留在《旧约》中,但路得的故事仍旧体现了男性的伟大。故事中的男主角波阿斯被塑造成宽宏大量,极具责任心的正人君子。路得嫁给波阿斯,并成为以色列大卫王的祖母,耶稣也从大卫王一脉而出,路得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耶稣的家谱中。^②可见《旧约》作者在塑造路得这一贤妇形象时也没忘记将女性限制在“传宗接代”的规范之内。路得形象的塑造同样折射出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表现出父权制社会对男性权力和名望的维护。

《旧约》男性作者对理想女性的最大追求充分体现在《箴言》中。^③那位贤德的妻子“价值远胜过珍

① 有关阿荷利和阿荷利巴的寓言故事,记载在《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

② 路得是被载入耶稣家谱的四位女性之一,其他三位女性的姓名见《马太福音》第一章。

③ 《箴言》第三十一章详细描述了男性理想中的贤妇形象。

珠”(箴言 31:10);“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 31:11-12);她勤劳善良,“她的灯终夜不灭”(箴言 31:18);“她张口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箴言 31:20);她极具智慧,“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箴言 31:26)。这位被颂扬的女性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然而,她无名无姓,更无外貌描写。她或许只是一个虚拟的符号,只是男人的梦想和追求。

三、结语

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旧约圣经》中的女性形象,可清晰地看到,男性作者对女性的贬低和赞扬正折射出男人对女人的矛盾心理:他们既十分向往女性温柔善良的美,又惧怕女性的智慧和勇敢会威胁他们自身的地位和权威。男性作者的这种矛盾心理使女性无法跳出男性思维中特定的女性形象模式,她们或是“天使”,或是“恶魔”,只有位居这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不幸的是,按父权制思想编撰的《圣经》,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以父权制的方式被诠释并被接受。以路得为代表的“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

的不幸与悲哀。但由于父权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更由于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对其弱点的认识的不足,女性要摆脱父权制社会长期以来对她们的种种误写、误读和误释,并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有她们光辉灿烂的人物形象,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这就是我们研究《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马自毅. 圣经人物[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2]朱维之. 西伯来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18.
- [3]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06.
- [4]梁工. 文学史上参孙形象的演变和发展. 外国文学研究[J]. 1999. 3.
- [5]孙绍先. 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0.

责任编辑:莲 郊

Th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Old Testament of the Bible: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LI Yan - b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Bible reflect men's depreciation for and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detailed survey of the 120 women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focuses on the typical women of the opposite extremes who could be in the center of male discourse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men. One extreme is represented by Delilah as a licentious woman leading to the death of Samson. The other extreme of women is represented by Ruth who was created as a virtuous woma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uch a virtuous woman as Ruth may serve as a relief for women's misfortune and grief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the Old Testament.

Keywords: the Old Testament; image of woman; Delilah; Ruth; patriarchal culture